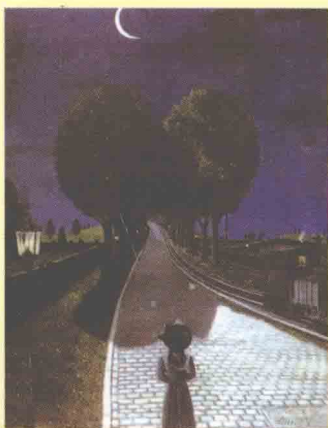


比竹小品

止庵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比竹小品

止庵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比竹小品 / 止庵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60-6110-1

I. ①比… II. ①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279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6.5 1 插页
字 数	9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序	1
“周启明颇昏……”考	3
鲁迅的另一面	9
鲁迅与朱安	14
鲁迅杂文集的编法与说法	21
鲁迅的合作作品	37
鲁迅遗著的出版	47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答问	61
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	75
关于苦雨斋	80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93
“周作人传统”与文载道	103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111

胡张初识考	122
张佩纶的遗产	130
再谈《小团圆》	134
张爱玲文话	145
《异乡记》杂谈	151
《重访边城》原稿校读记	157
由舒芜之死而想到的	164
《上水船集》编后记	169
“六言诗案”及其他	173
谈丐辞	179
《老八舍往事》跟帖	182
话说“书之书”	187
也谈毛边书	192
阅读的乐趣	196
后记	200

序

《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看出“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答以“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又说：“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人籁”不如“地籁”，时下倡导“返归自然”者亦如是说；“地籁”不如“天籁”，大概只有庄生才有这般见识。无论“人籁”“地籁”，皆系人家借声；自然而然，方为“天籁”。赵德《四书笺义》：“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我之于吾，乃是外来影响，犹风之于窍，人之于竹也。“吾丧我”，即

“使其自己”；说真正属于自家的话，就是“天籁”。然此事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我作文多年，自愧仍是“比竹”耳。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

“周启明颇昏……”考

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中说: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这番话常被人引用,乃至据以立论。然而鲁迅致许广平此信尚有后文,即周建人以“……”替代者:“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外事”与“废名”之间用逗号,本是一句整话。

《鲁迅全集》于信中“废名”下有注释:“冯文炳的笔名。”

参看 300524 信注[2]。”“300524 信”是致章廷谦的，有云：“《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注[2]”系于“丙文”下：“指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那一篇短评，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载《骆驼草》周刊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署名丁武。”如此，则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乃是重提两年多前的旧事了。

实际上鲁迅另有所指，虽然对象仍是废名。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鲁迅日记云：“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复查鲁迅当年书账，此二书一为《周作人散文钞》，一为周作人著《看云集》。《周作人散文钞》（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版）有废名序，其中说：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东方文明’，甚致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

缺少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汇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 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

鲁迅十一月二十日信中所谓“攻击”,即指此也。废名贬鲁迅而褒周作人,又一向得到后者扶助,故曰“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云云,有其具体语境,并非泛泛而论。

曾有论者考证唐弢回忆鲁迅的《琐忆》不无虚构之处,进而提出“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必须清理”。《琐忆》忆及鲁迅与青年们的谈话,与鲁迅所写《黄祸》、《忆刘半农君》、《说“面

子”》和《奇怪》中的文字“竟惊人的一致”。此类回忆，最难辨别真假。周建人说：“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未必是由“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演义而成，但至少没有讲明鲁迅是在何等情况下发此议论。忽略语境，特殊判断就会被看作一般判断。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即鲁迅逝世后六日，周建人致信周作人说：

“惟他于前数天病中讲到关于你的话，追述于下：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

“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偃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

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的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时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之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想起,便说明几句。”

相比之下,这比同一回忆者多年之后——周作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致许广平信亦已揭载——的说法或更可靠。顺便对此信稍作解释:一,“救国宣言”,指一九三六年十月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等联名发表的《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二,“送×××之子赴日”,指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保护烈士遗孤李葆华,并将其送往日本留学;三,“讲文天祥(?)的一段文章”,或指周作人作《关于英雄崇拜》(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收《苦茶随笔》),其中说:“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

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四,“前次趁(赴)日时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或指井上红梅《采访周作人》(一九三四年九月《文艺》第二卷第九号)中所载:“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创作方面基本上没有拿出什么东西。”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六日

鲁迅的另一面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周作人写过一篇《鲁迅的笑》，有云：“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的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相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自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

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但时至今日，人们往往只记住鲁迅的“严厉可畏”和“战斗的愤怒相”了，又并非因为读了他“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得此印象，反倒是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

周作人又说：“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里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多少有过些经验。”这在鲁迅的友人、学生和同事写的回忆录里有所展现，较早问世者如郁达夫的《回忆鲁迅》、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等，所描绘的鲁迅形象都很亲切。后来的回忆之作就多刻意强调鲁迅“盾的向外的一面”，甚至弄得有点真假难辨了。

鲁迅还有不少书信传世，藉此亦可体会他“另有一副和善的相貌”，而且不仅限于对待友人。且举个例子。鲁迅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日记云：“午后得夏传经信，即复。”夏传经是南京盛记布店的店员，鲁迅与之素不相识。据夏氏后来告诉许广平，“这信的内容，是问先生《竖琴》的前记和《野草》的序诗，怎么在最近出版的原书里没有了，以及怎样研究文学，并说了一些我读《伪自由书》的感想，说是，我简直不拿它（《伪自由书》）当文学书看了，这是一本很好的预言书。

又抄了些我读过的先生的著译，问先生还有什么书未读到的，请先生告诉我。”鲁迅回信说：

“《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

“《高尔基文集》非我所译，系书店乱登广告，此书不久当有好译本出版，颇可观。《艺术论》等久不印，无从购买。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

“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但近来文网日益，虽有所感，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

“别纸”所列书目，计“作”五种，“编”三种，“译”十六种——据夏传经说，“这上面的书，都是我那时不曾读过的。”——鲁迅多有自我评价，如《壁下译丛》、《思想·山水·人物》曰“已旧”，《近代美术史潮论》曰“太专”，《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俄罗斯的童话》、《十月》曰“尚可”，《小约翰》、《死魂灵》曰“好”。有些绝版或被禁止的，也都一一注明。作者对待一位普通读者，大概至此已尽人事。然而五天后，鲁迅日记云：“寄夏传经信并书四本。”信中说：

“顷偶翻书箱，见有三种存书，为先生所缺，因系自著，毫无用处，不过以饱蟫蠹，又《竖琴》近出第四版，以文网稍疏，书店已将序文补入，送来一册，自亦无用，已于上午托书店寄上，谨以奉赠。此在我皆无用之物，毫无所损，务乞勿将书款寄下，至祷至祷。”

夏传经先收到鲁迅的信，“这封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先生赠了我这么多书。于是我便注意着邮差：一次又一次地过去了，却总不见寄书来！这时我的心里真难过极了，又不知道先生是送我几本什么书，又怕被邮局扣留（这倒非心多过虑，我买的书，的确有很多被他们扣去了！）在这种心情下，熬过了一夜，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收到书，赶忙拆开一